

宋元时期的海洋贸易

□ 陈鸿彝

中华海洋文化是一个繁复的文化体系，不仅仅是“望海为生”而已。到宋元时期，中华海洋文化走上了以海外贸易为主干的全新轨道，与沿线各国公平交易，和谐共赢。

造船业与航海业高度发达

造船业是航海业的先行产业。商船要装上大批量的货物去南洋贸易，非造出千吨级海船是不行的。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，而且船体庞大，据《梦梁录》记载，宋代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 500—600 人。其时，中国船可以通行于南洋和“西洋”（今印度洋），而大食商人从波斯湾出发东来时，则要在锡兰湾换成宋舶才行，那是要以高度发达的造船业与高度发达的航海水作保证的。

宋人航海的优势在于：用上了罗盘针，可以在茫茫大洋上作经纬定向与定位；海轮用隔舱技术造成，舱壁用双层松木板料，一舱破损漏水，对邻舱无影响，可以持续远航；能够绘制“海图”，熟悉航线，还知道利用海洋信风与洋流往返。南宋赵汝适著《诸蕃志》中的海图，不仅标出了南海诸岛的位置，而且标出了南洋诸国的位置。

沿海城市发达

宋代海外贸易很有成效。其时，杭州、广州以“天城”“广府”的名义享誉海外，泉州在“刺桐”的名义下以“东方第一大港”蜚声西亚、北非与南欧。宋元时期，设有市舶司、市舶务或舶场的都会与商埠，像一串明珠，撒落在沿海一带，北起山东半岛的密州、青州，中经古长江口的扬州、江阴、苏州、上海、华亭、青浦到杭州湾的澈浦、杭州、宁波及温州，南到闽广一带的泉州、福州、漳州、潮州、广州等，每个城市和商埠，都有广袤的腹地为之提供丰饶的农副产品。它们奠定了沿海沿江城镇的规模，带动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的大发展。如景德镇的瓷器业高度发达，经久不衰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懂得从海外发现并有效组织优质原



材料的供应。宋元造纸、印刷、制茶、丝织、瓷器等品位极高的“文化型产业”特别兴旺；规模经营与个体经营相结合，为劳动力的自由择业与自主兼业提供了可能。中外海陆交流也就空前深化了。宋元开始，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同步发展起来，大量中国商人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基地，特别是对南洋群岛的开发费尽了心血。这是中华文明特具之风采。

宋高宗赵构说：海外贸易，获利颇丰，“岂不胜取于吾民”。

海上法规的制定与施行

世界最早的“海外贸易管理机构”“海外贸易法规”“航海安全法规”“侨民管理法规”，均诞生于宋元时期的中国。

宋建国之初，朝廷就设置了“提举市舶司”，专“掌蕃货，海舶、征榷、贸易之事”。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（976），又在京师设有榷易院（署），专管对外贸易，后又相继在广州、杭州、明州（宁波）、泉州设立市舶司，史称“三路市舶”。元丰年间（1078—1085），宋政府又颁发了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专项外贸法规《市舶法》，即进出口贸易法规。它规定榷易院与市舶司责在招徕外商，发展外贸。其“榷易”的基本办法是：外商船舶进出口岸后，停在海上，由宋朝廷派市舶官员登舶查验货品，按一定比例抽取实物，以“贡品”的名义由番商运交宋政府，这其实就是国家的“进口税”；来华的外商头领要拜会地方当局，一般还安

排朝见皇帝，皇帝要给商团大量“恩赐”，其价值往往大大超过其所“进贡”，为的是让外商觉得有利可图，经常来华贸易，换句话说，“进贡”原是一种有偿的交换方式，中国皇帝有“面子”，来华商贩得“里子”。抽取“贡品”之后，凡属国家统购包销的“禁榷物资”，由市舶司出钱购买，不超过全数的 30%；其余商品称“博易物资”，由中外商人按市价自行买卖，也可由番商自行运销内地。这成了宋元明清海外贸易的一个特色。元代干脆废除了禁榷制度，只抽解其货物的 1/10 到 1/15 作“进口税”，其余商品一概自由经营。现在有人用“朝贡贸易”来概称中国古代政府主持的外贸，这显然是不准确的，“朝贡”从来不是外贸的主体内容，只是收取“进口税”的一道必要手续；而收取的比例很“透明”，返还的利润更大。

南宋后期，任命蒲寿庚“提举泉州市舶司”，主持海外贸易 30 余年。蒲寿庚是北非商人（还有一种说法是欧洲人的后代），精通海上贸易，积资过亿。元军攻灭南宋后，继续任命他主管东南海外贸易，制定了《大元市舶司刑法》，健全了外贸管理体制，完善了外贸管理法规。这样，中外海上交往，就不仅未因宋元易代而有所中断或有所挫折，相反，却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了。

宋元涉外管理中的公正双赢原则

宋元涉外管理，是在开放心态主

导下进行的。唐宋时称外国人聚居地为“蕃坊”，不仅长安、洛阳、开封有之，广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明州、扬州、青州等地均有。住在蕃坊的人，保持着本国的习俗与信仰。在这里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纠纷，依中国法律审理；外国人之间的诉讼，触犯刑律者按中国法律惩处。蕃坊内的一般民事纠纷，依本国习俗处理。中国政府尊重外商合法收入；外商曾主动请求捐款修建广州城，宋政府也没有同意，生恐由此滋生贪腐。中国政府尊重外侨的习俗与宗教文化；泉州就建有清真寺等，各地蕃坊还建置“蕃学”，是专门的外籍学校。外商多富豪，车马舆服与宅舍极为奢华逾制，但宋政府并不干涉，但在中国政府任职者必需穿中国官服。

为保护外商权益，首先是立法。北宋元符二年（1099）订立了关于海上贸易防守、盗纵、诈冒断罪法；规定外商船舶遇险时必须救助，并规定了救助办法，如商船为风浪所损，甚而船主失踪，官府也应进行抢救，并登录全部物品，允许其亲属取回。其合法利润，由其自由支配，子孙继承。对贪冒行赃、走私漏税（当时称漏舶）等情，宋政府加强了打击措施，撤办那些“罔顾宪章，苟徇货财，潜通交易”的官吏，用重法处置收买番商杂货与违禁货物的一切涉外官员，并特别规定外商如遇贪冒官员，可越级申诉，一经查实，即行“计赃坐罪”。

元政府明文申禁市舶官员，禁止私托外商购买进口物资；也不允许市舶官员故意压价自行折卖，或借查验之机接受“呈样”（其实是贿赂）；规定中外商舶一律凭“公据”“公凭”进出港口，从事商贸。无证贸易，“告捕治罪，货物没官”。为了防止海盗，商舶出洋可带自卫性武器刀剑弓箭与铜锣，但一抵口岸，则需交给市舶司代管。商旅在内地经营，则将货品一一登录交柜，由所投宿旅馆代为保管与出纳，至期交验结账就行，避免了人地生疏之困扰，且十分安全可靠。

可以说，在 9—13 世纪中外大交流中，东亚、西亚、中亚、南亚以至南洋、西洋，实现了文化上的声息相通。精神互补，物流交汇，亚洲文化的高品位得到了有力的展示。

中华春秋



□ 赵王玮

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；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卖酒钱。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换来花下眠；半醒半醉日复日，花落花开年复年。但愿老死花间酒，不愿躬躬车马前；车尘马足富者趣，酒盏花枝贫者缘。若将富贵比贫贱，一在平地一在天；若将贫贱比车马，他得驱驰我得闲。别人笑我忒痴癫，我笑别人看不穿；不见五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

——[明]唐寅《桃花庵歌》

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，唐寅诗画双绝，诙谐而多情，所以在民间传说中很受欢迎。这首《桃花庵歌》就是他的诗集中最著名的作品，用以自况、自谴兼以警世。善于读诗的人，还能读出几分颓唐。状若疯癫，实则高傲，看破红尘，不无轻狂，看似洒脱，却又孤独，这是他深埋心底怀才不遇的悲愤的折射。

只当漂流在异乡

出身商人家庭的他，自幼聪明伶俐，才气过人。可惜横遭不幸，20 余岁时家中父母、妻子、妹妹相继去世，家境顿时衰败。这时好友祝枝山规劝他潜心读书，在 29 岁时，他参加应天府公试，取得第一名“解元”的好成绩。第二年他赴京会试，却碰上了改变他一生的考场舞弊案。

桃花坞 无花无酒锄作田

当时的主考官是程敏政和李东阳，两人都是饱学之士，出题冷僻，让很多应试者答不上来。其中唯有两张试卷，不仅答题贴切，且文辞优雅，这让程敏政十分高兴，脱口而出：“这两张卷子定是唐寅和徐经的。”这句话被在场人传了出来，徐、唐两人本就名声在外，在京师的行动格外惹人注目，考试一结束，满城盛传两人买了试题，程敏政立马就被弹劾。换到今天，相当于故意泄露高考试题，犯了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，可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明孝宗另派李东阳和其他考官进行复审，结果证明徐、唐两人并不在录取之中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。为平息舆论，朝廷便让锦衣卫严加审讯，最终以徐经进京晋见程敏政时曾送过见面礼；唐寅曾用一个金币向程敏政乞文、送乡试座主梁儒的理由，将两人削除仕籍，斥为县衙小吏。唐寅深以为耻，不料回家以后夫妻反目，第二任妻子也离他而去，所谓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就是如此。遭受接连打击，消极颓废的他筑室“桃花坞”，聊以自娱。

正德九年，他应宁王朱宸濠重金之请，到南昌半年有余。后来他察觉宁王谋逆，不想再卷入政治风波的他装疯卖傻，在大街上裸奔，才得以脱身回乡。从此思想更加消沉，转而信佛，自号“六如居士”。

虽然他在诗文方面和徐祯卿、文征明、祝允明并称“吴中四才子”，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江南四大才子，但

是他的境况却是最糟糕的。不会持家的他只能以卖画为生，拮据多病。王世贞批评他“如乞儿唱《莲花落》”，大抵是说他诗风酸酸浅近，这与他窘迫的生活境况是息息相关的。

可就是这么一个穷画家，居然敢贷款买下一套别墅园林，哪来的底气呢？桃花坞又有什么吸引了他，值得他如此孤注一掷呢？

此地宜有画仙

桃花坞，在如今苏州市桃花坞大街及其周边地区。这片区域最初是汉代长史张平子的家园，主要种植桑林。后经时代变迁，所种植之物变成了桃花。唐寅的桃花坞，并非一片街区，其实只是一座园林，它的前身叫作五亩园。追溯历史，我们可以查得宋熙宁年间，吴县人梅宣义在此筑台治园，柳堤花坞，池石假山，风物一新，因地有五亩之广，称“五亩园”，随主人名叫“梅园”。因其内多种桃树，桃花最胜，又称“桃花坞”。

宋代绍圣年间，枢密章槩在五亩

园南面建筑别墅。占地多达 700 亩。章氏子弟在此基础上又广辟池沼，建成了一座庄园式园林，人称“章园”。《吴门杂隐》誉其“园林第宅，卓冠一时”。梅、章两家为世交，梅宣义之子梅采南、章槩之子章咏华，就曾仿效古人，曲水流觞，将两园池塘打通。当时多人多于此春游看花，一时盛极。南宋末年，梅园、章园因战火都成为废墟，逐渐荒芜。

这么一块宝地，怎么少得了文人的目光呢？到了明代弘治年间，36 岁的唐寅看中桃花坞的景色，卖画挣钱，买下章槩的桃花坞别墅，取名为“桃花庵”，并在四周种桃树数亩，唐寅亦自号“桃花庵主”，筑室定居，写下了《桃花庵歌》。他死后就葬在桃花坞北，到了嘉靖二十六年被迁葬到横塘镇王家村。到明崇祯年间，文人毛晋和朋友春游之时，见唐寅墓地荒芜生荆，牛羊践踏，顿时凄然感叹曰：“千载下读唐伯虎之文者皆其友，何必时与并乎！”于是慷慨解囊，出资整修，还造了三间屋子作祠供奉他。根据老朋友祝枝山给他写的墓志铭中所说，他晚年隐居桃花坞时，常与沈周、祝允明、文征明等人饮酒赋诗，挥毫作画，一同饮酒尽欢而散，客人离开了也不问，醉了便倒头酣睡，颇有些“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”的风采。

从清代开始，桃花坞的年画作坊就十分出名，它生产的年画如今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年画品种之一，或许这是传奇的另一种收尾。

在历代雄主中，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最善于用人的一位。在他任上，有魏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一大批当世闻名、后世流芳的贤人。唐朝能够迅速从隋末的战乱中恢复，开创贞观之治、大唐盛世，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用人谋略是分不开的。

所谓用人，当然不只是知人，也不只在量才录用，更体现在用其言、显其能。对于贤能来说，不仅是居上位者能尊重他，更希望用其能以治事，否则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岂非有“闲愁最苦”之叹？在这个意义上，唐太宗的用人谋略更值得后世深思。同时，又因其时已由乱转治，其承平时期在用人内涵上的开拓，更有划时代价值。

延四方文学之士

从 617 年于太原起兵，不到半年即攻入长安，到 618 年农历五月李渊即皇帝位，隋朝其亡也忽，唐朝其兴也勃。李世民攻城略地，功勋卓著，于 621 年被唐高祖任命为天策上将。这时的李世民，因为国家逐渐平定，便在宫殿西侧设馆，“延四方文学之士”，任命秦王府属 18 人兼任文学馆学士，号称“十八学士”，其中就有杜如晦、房玄龄、虞世南、褚亮等贤达。士大夫能够成为文学馆学士人选，当时人就称为“登瀛洲”，意谓一步成仙。李世民未登大位即如此重视人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李世民功名日盛，而太子李建成喜酒色，齐王李元吉多过失，高祖有意让李世民取代李建成，于是冲突不可避免。一番争斗诋毁不可尽书，最终使李渊对李世民政远猜疑，李世民也喝了李建成的毒酒差点没命，以致水火不容，“存亡之机，间不容发”。李建成的策略开始升级，把秦王府的人才全部排挤掉，拉拢尉迟敬德不成便欲杀之，诬陷程知节（即程咬金），如程所言“大王股肱羽翼尽矣，身何能久”，最后把房玄龄、杜如晦都诬陷斥逐了。李建成拿李世民的人才下手，致其无人可用而成孤家寡人，可谓切中要害。

关键时刻，于 626 年，李世民伏兵玄武门，杀李建成、李元吉。于是唐高祖立李世民为皇太子，一应国事，全由李世民处理，再听奏报。于是，李世民开始起用一批贤能。其中就有原太子李建成的洗马魏征。李世民能用魏征，显其雄主大肚量处，也从此开始了魏征在大唐盛世的重要出演。

不久魏征即干了一件见品行的事。朝廷派他安抚山东，任凭他见机行事。结果他私自放了原太子千牛李志安、齐王护军李思行，并说自己“且既蒙国士之遇，敢不以国士报之乎”！李世民闻之甚喜。这一年八月，李渊把皇位传给李世民，自己做了太上皇。从此，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，开创大唐盛世。

大公无私才能天下归心

626 年 9 月，李世民开始封赏功臣。和其他朝代一样，这种封赏往往都会争论不休，如何平息争论，令众人皆服，最见雄主智慧。当时，淮安王李神通说：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，“今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专弄刀笔，功居臣上，臣窃不服”。而秦王府旧僚属未能升官的，皆埋怨“吾属奉事左右，几何年矣，今除官，反出前官、齐府人之后”，这些人，和淮安王、壹叔一样，都是典型的“家天下”思维。唐太宗当时即予以驳斥：“王者至公无私，故能服天下之心。朕与卿辈日所衣食，皆取诸民者也。故设官分职，以民为也，当择贤才而用之，岂以新旧为先后哉！必也新而贤，旧而不肖，安可舍新而取旧乎！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，岂为政之体乎！”这段话连续三个反问，有破有立，先立后破，酣畅淋漓地批评了那些瞎议论乱埋怨者。其所立者，千载以下仍灼灼其华，令人警醒：大公无私才能天下归心；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设官定职都是为百姓，理应择贤而用决不可为私。

如何考察用人？太宗的做法很独特，把都督、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，坐卧都留心观看，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，均注于他们的名下，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。这“名于屏风，坐卧观之”，表明太宗把人才放在心中、把用人放在首位。我们今天强调县委书记的极端重要性，当时的太宗则说：“县令尤为亲民，不可不择”，真可谓古今一理。当时，太宗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，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，报上他们的姓名。太宗

□ 陈家兴

用人谋略与贞观之治

唐太宗李世民用人史话（上）

宗治政，确能抓其关键。

进入 629 年，太宗便任命房玄龄、杜如晦为左右仆射，魏征为秘书监，“参预朝政”。三位贤臣被放在了关键岗位上，并下令，尚书省琐事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，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，才由左右仆射处理。这是为他们减轻俗务负担，而一心抓大事，求贤能。房玄龄与杜如晦“引拔士类”皆不遗余力，可以说为大唐发现任用了一批人才。

不独私故人

当时，房玄龄、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处。太宗便命侯君集重加推勘。照理这都很在理，但真要这么做了，又会有什么后果？幸好魏征看出其中端倪，便劝谏道：房、王都是老臣，素以忠直为陛下信任，所考核官员过多，中间没有一二人考核失当？体察其实情，绝不是有偏私。如果找到失当处，那就不可信，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？

魏征着眼的是大局与后果而非具体是非。毕竟，贸然行之，首先就是隐含着一种不信任，其次发现有一二个人失当，则等于得失当放大而掩其绝大部分得当，也是一种不公平。魏征接着分析权万纪的动机，说他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，并没有任何驳正，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，才开始陈述意见。“此正欲激陛下之怒，非竭诚归国也。”最后，太宗便放下此事不再过问。总的来看，太宗重加推勘有点矫枉过正，但完全不察也有失公平。

这一年，太宗还差点干了一件徇私情的事，还好又是魏征及时劝阻。当时，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免职，上表陈情说是秦王府僚。太宗怜惜他，想让他官复原职。魏征和太宗的一番话，更振聋发聩。

魏征说，秦王府的旧僚属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，“恐人人皆恃恩私，足使为善者惧”。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征的意见，说的话也发人深省：“我昔为秦王，乃一府之主，今居大位，乃四海之主，不得独私故人。大臣所执如是，朕何敢违！”于是赐帛打发他走了。由此想起毛泽东同志曾为自己定下的三条原则：“恋亲，但不为亲徇私；念旧，但不为旧谋利；济亲，但不以公济私”，把亲旧看得重，更把公与私分得清，这才是居上位者应有的情怀。

选人用人史话